

《求索》丛书

中国课程变革研究

主 编 杨玉厚

副主编 张先华 胡学增 沈勉荣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求索》丛书

中国课程变革研究

主编 杨玉厚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5.625 印张 5 插页 403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1—3,300

ISBN 7-5419-3470-4/G·2994

(精装) 定 价: 16.50 元

序 言

《求索》丛书是在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战后国外教育思潮研究”与“国外现代教学论流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战后，世界性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一场全球性的产业革命——被人们称为“第三次浪潮”冲击着所有的传统堡垒。教育被许多国家视为第一战略产业，革新教育、探索 21 世纪未来教育、教学的新模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这种世界性的教育变革，首先是以教育观念、理论的变革为其先声的。40 多年来，各种教育思潮迭起，流派纷呈，她多变而富于魅力。

纵观战后教育科学的走向，她的显著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育科学从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里汲取营养而日趋丰满，许许多多新的教育学分支，例如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技术学……如雨后春笋般地从传统教育学这块丰腴的理论土地上生长起来；其二，现代哲学、心理学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为人类探索“心中的宇宙”提供着有力的武器。例如：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理论，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结构教育理论和以奥康纳为代表的分析教育哲学理论，以及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是很值得重视研究的代表性教育理论；其三，教学论和课程论的研究是战后教育科学的目标。在教学论领域，由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和以达维多夫的发展教育论、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论作为代表；在课程理论领域，则是以学问中心课程和人本主义课程作为战后两大崭新的课程理论出现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

站在这世纪性的潮流中，探索它的源头，把握她未来的趋势，

正是我们这套丛书所追求的目标。

《求索》丛书力图把握战后教育科学的历史走向，向读者展示世界教育科学若干分支的新进展，尤其是教学科学和课程理论的新成果。而在纵向的描述中，丛书又选择了前苏联、美国和德国作专卷介绍。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教学论流派正代表着当代世界教学论发展的主流。

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的同时，我们还比照我国自己的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从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高度，对学校课程的沿革、教学论研究的基础理论以及若干有特色的中小学改革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力图为我国的教学和课程改革提供一点新的构想。

我们正站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个台阶上，眼前，是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为 21 世纪的发展奠定基础，我们的教育应当从今天就开始进行。我们已经失去过多次机会，而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不能是无限多的。因此，当我们在踏上 20 世纪的最后一级台阶时，必须作出比 80 年代更加紧张、更加理智的行动来。

无论是在课题的研究还是在丛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我国著名的老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刘佛年教授的指点，还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友先同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赵喜民同志的鼓励和帮助。我们还衷心感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得以使这套丛书能顺利地同广大读者见面。

我们谨以《求索》丛书，献给所有为探索我国现代化教育理论和体制的人们。

但愿本书有更多的良师益友。

《求索》丛书编委会

1992 年 4 月于上海

前 言

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至今，不觉已有十六七个年头了。十六七年来中小学的教育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类型多元化的趋势，使我们有了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完全中学与初级中学、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等等。课堂教学模式的多元化趋势，培养出一批各具特色的骨干教师，加上现代传播手段与媒介，使这些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得以广泛地流传开来。在评价观念与评价技术上，由于客观评价技术的发展，对教育评价教育性的追求，也有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在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中，理应是改革的重点工程的课程改革，课程理论的建设，却似乎发展得最不平衡。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心目中，现行的课程体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课程惯性”使他们无意之中成了课程改革的阻力，甚至对教材中一词一句的修改也往往会招致抵制。

然而，恰恰是现行的各种传统的课程教材，扩大了中小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时空差距。恰恰是现行的课程体制与模式严重地束缚了中小學生个性的发展。甚至在价值差距甚大的不同类型的学校中，也都在使用着一套完全相同的课程与教材。一方面我们的莘莘学子千辛万苦地背诵教材中的一字一句，以优异的高分获取高考的桂冠。另一方面我们的高校对这些百里挑一的芸芸众生却并不满意。他们被蔑称为“高分低能”。我们的社会也对从升学考试中落选下来的毕业生颇多微词，对中小学教育的责怪之声不绝于耳。确实，中小学课程的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

诚如著名的课程专家钟启泉教授所指出，“在我国还没有扎实地展开课程论的研究；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客观的课程评价制

度。”（《现代课程论》）课程的改革决不仅仅是对现行课程教材的修修改改。它还包括了从现行课程模式的外部去探索与创立一系列新的课程模式。从大系统的高度去认知和把握课程的理念。对于课程开发的这种理解，使我们不得不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去分析课程的体制；从课程开发的历史去把握课程的理论；从课程改革的实践去认识课程开发的策略。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组织一些教育学者研究、撰写并选编了这本《中国课程变革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分成古代与近代及当代三大部分。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从不同侧面进行分析与阐述。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目的，一是从我国课程发展的沿革中，采撷历史赋予我们的教训。二是使有志于课程改革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对历史和现行课程的方方面面引发一些共同的探讨。

这就是我们的愿望。

杨玉厚 胡学增

张先华 沈勉荣

1992年10月

目 录

一、中国古代课程研究

1. 孔子课程思想剖析 牛梦琪(1)
2. 德育在古代课程中的地位 宋德民(19)
3. 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课程的关系 王治军(44)
4. 中国古代官学与私学课程考辨 徐继存(58)
5. 中国古代学校课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萧 弓(79)
6. 经学课程变迁史略 袁战国(86)
7.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及其课程研究 和学新(105)
8. 中国古代蒙学课程的特点 谢励武(124)
9.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对课程的影响
..... 方国春 胡淑云(135)

二、中国近代课程研究

1. 太平天国教育内容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傅兴国(154)
2. 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及课程设置 张先华(169)
3. 中国近代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及其他 张先华(185)
4.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课程 李元华(201)
5.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探寻 李兆良(221)
6. 近代实业教育及其对普通教育的渗透 袁战国(237)
7. 评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课程思想
..... 吴 霓(251)

8. 试论改良派的课程观 程合印(261)
9. 1922 年中学课程改革及其反思 曲铁华(279)
10. 人民教育光辉的第一页
——革命根据地学校课程初探 陈守贵(302)
11. 陶行知的课程教育思想 张兰馨(321)

三、中国当代课程改革研究

1. 我国学校课程和教材的发展与改革 游铭钧(344)
2. 上海市课程和教材改革的总体构想 王生洪(352)
3. 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 改革中小学课程与教材 袁 采(359)
4. 迎接未来挑战的中小学课程改革
..... 恽昭世 吴立岗(371)
5. 学科中心课程在我国的历史命运
..... 沈勉荣 胡学增(390)
6. 课程改革——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 沈勉荣 胡学增(417)
7. 关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若干思考
..... 胡学增 沈勉荣(423)
8. 关键在于建立新颖的课程和人才评价的
科学体制 胡学增 沈勉荣(430)
9. 对中小学五次教改实践的反思 ... 胡学增 沈勉荣(436)
10. 关于课程评价策略的哲学思考
..... 胡学增 沈勉荣(442)
11. 论自然科学教育两大课程观的融合及其
对自然科学教材的影响 胡学增(449)
12. 论中学自然科学教材的改革 胡学增(456)
13. STS 教育改革对我国理科教育的启示 ... 梁英豪(464)
14. 二十一世纪普通中学自然科学教育展望
..... 胡学增 胡瑞文(487)

一、中国古代课程研究

孔子课程思想剖析

牛梦琪

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首创私学，打破了奴隶制官学死板、僵化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为当时社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学者和治术人才，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要弄清孔子是如何获得这样巨大的教育成就，仅研究其教学方法及教学态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教学内容，准确地说是课程思想加以研究和探讨。本文拟就孔子的课程思想作一尝试性的剖析。

孔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未能施展其抱负，因而将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寄希望于弟子，想将弟子培养成为能够承其志、行其道的志士、君子和仁人。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是辉煌的。他一生号称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登门受教的弟子，数量也相当可观。孔子的弟子年龄差别很大。年龄最大的只小孔子4岁，最小的则比孔子小54岁。这些学生，不仅年龄悬殊，其性格、学识、修养、才能也各不相同。面对如此众多、又情况各异的学生，如何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把他们培养成志

士、君子，孔子在课程的分类和设置上是有所考虑的。《论语·子张》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就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在子夏看来，学习的内容犹如草木，是要区别为各种各类的。哪些应先传授，哪些要后讲述，是要依照一定的次序的。对于那些年龄较小、入学时间较短的学生，应先传授其一些“洒扫应对进退”之类的礼节仪式，以培养其道德情感和习惯。子夏在孔门私学中以文学著称，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并深得孔子的教授之道。他居西河教授，曾为魏文侯师，弟子 300 人，序《诗》、传《礼》、传《春秋》，基本上是承袭孔子私学旧制，能按照次序有始有终地教授弟子。由此可见，孔子在其私学中，为年龄、才能、修业程度相异的学生是设有相应的课程的。

要了解孔子私学的课程设置情况，首先要弄清课程一词的含义。课程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唐宋时期，其基本含义是指课业及其进程。也就是说既包括教学的内容（或科目），又包括这些内容（或科目）教学的时间和顺序。这并非是说未有课程一词之前，教育就没有一定的内容及其进程的安排。事实上，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关于教育内容及其进程就有了一定的安排。据《礼记·内则》篇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寄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礼，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孔子作为杰出的大教育家，从其教育目的出发，主张教育要使学生首先具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尔后再培养其品德，增长其知识和技能。他所主张的教育内容，从不同角度分析，可概括为以

下四点：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三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当时，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四曰：六书。在孔子之时，六书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己整理编订的，后世尊之为“六经”。由此可见，孔子所主张的教学内容既有道德修身课程、智能知识课程，又有军事体育课程和“事上”的艺能课程。

从当时的社会需要及个人人格的形成来看，孔子的教育内容及课程设置可以说是基本完备了。而从教育的程序和进程来看，孔子把学生进德修业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行束脩的入门阶段、升堂阶段和入室阶段。现分述如下。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对于向他行过请为弟子的“执见礼”者，他即视为弟子，加以教诲。而对于这些年龄较小、程度较低的初行束脩、刚入孔门阶段的弟子，孔子为其设置的课程内容，主要是道德概念的认识、道德及礼俗行为和习惯的培养，以及一些技能技艺的训练。

在道德概念的认识上，孔子曾提出过一系列道德条目。要求学生对这些条目有明确认识。如对：“孝”、“悌”、“信”、“义”、“忠”、“恕”、“智”、“仁”、“勇”、“敬”、“恭”、“宽”、“敏”、“惠”等道德概念的认识。孔子主张“正名”。《论语·子路》篇记载，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即是明白确立和贯彻君臣父子的名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秩序。因而孔子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要把代表着这种道德规范的道德概念传授给学生，以形成他们的道德认识。

所谓“孝”，指孝亲。这是为子之道。能奉养并尊敬父母为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孝（《论语·为政》），“子为父隐”为孝。（《论语·子路》）要求学生做到“入则孝”（《论语·学而》）。

所谓“悌”，指敬长。这是兄弟之道。爱护并敬重兄长为悌。要求学生做到“出则弟”。孔子把孝悌视为一个人立身之本，认为孝悌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因为将孝悌推广开来，即可培养对国、对君、对人、对友的信。因而他把“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作为士的一项基本条件。

“信”是指信实，守信用。与朋友交，要“言而有信”。“信”，更是治国的重要条件之一，甚至比足食、足兵还重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信”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有独特的作用。他的学生曾参就把“信”作为每天的功课之一，即每日三省中的一条。

“义”就是适宜、合理。自觉地按当时社会要求的道德准则去做叫义。要求学生在行动时首先要考虑到义。“君子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要“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尤其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他还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子路》）“义”因而也是治国者必备的品质。

所谓“忠”即尽心竭力。孔子很重视“忠”，要求学生対国、对君、对人、对工作都要做到“忠”。他说：“臣事君以忠”，要“言思忠”（《论语·季氏》），要“主忠信”（《论语·学而》），他的学生曾参就把“忠”作为每天的功课之一。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

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子贡所说的：“我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孔子把“恕”作为“终身行之”的道德要求。

孔子的“仁”，含义很广。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仁”既是治国安邦之道，又是一种道德修养和学问之道。孔子的“仁”常与“智”、“勇”并提，认为仁、智、勇是君子的三种品德。《论语·宪问》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天子自道也！”孔子还说：“仁者必勇，勇者不必仁。”又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

可见仁包含了智慧和勇敢，又高于这二者。“仁”还包括孝悌。孔子的学生有若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仁”也包括“恭、宽、信、敏、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孔子还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具体解说了谦顺、宽厚、信实、勤敏、仁惠的作用。

孔子非常注意向学生讲清这些道德概念。以“仁”为例，因为“仁”的含义很广，为了使这些程度较低的初入孔门阶段的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仁”这一概念及其思想实质，孔子总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对象对“仁”加以解释。往往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仁”的实质。由于人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提高的，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学生，不同时期的几次问“仁”，得到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如子贡的两次问“仁”，樊迟的三次问“仁”，孔子回答的内容其侧重点就各不相同，但又都很重要。有时是就修己方面着眼，有时又从待人、执事等方面提出一定的看法。如：“爱人”、“立人”、“与人忠”，是谈待人；“克己”、“居处恭”是谈修己；“执事敬”是谈执事。其他如问“孝”、问“礼”等，孔子都是这样，都是从学生的性格、学识、道德、修养水平等实际情况出发，个别指导，因材施教。

孔子除了重视向学生传授道德概念，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让学生明辨是非外，还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行为的训练，使学生恰当地行事，行止适当，并注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及礼俗习惯。

孔子很重视生活中的礼，不仅在冠、婚、丧、祭等的典礼中孔子自己相过礼，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际往来，应有的礼貌礼节，孔子也很重视。孔子经常率领学生在大树下习礼，执礼时还要用当时通行的普通话——“雅言”。孔子首先要求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饮食、起居、谈吐等礼貌礼节上要举止得当，并养成习惯，进而要求学生在重大的礼俗活动中能担当起相礼人

的职责。《左传·昭公七年》就记载有鲁国当政贵族孟僖子在外交活动中，因不精通礼仪而失了体面，回国后让自己的儿子孟懿子拜孔子为师，跟着孔子学习礼仪的事情。《左传·昭公七年》说：“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者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这段话讲的是鲁昭公七年的三月，昭公去楚国，郑伯在师之梁慰劳昭公，孟僖子当助手，不能相礼。到楚国后，孟僖子又不能对郊外的慰劳答礼。……九月，鲁昭公自楚回国，孟僖子十分愧悔自己的不精通礼仪，就开始认真学习。……到他病重将死时，他召集手下的大夫们说：“礼仪是人的主干，不懂礼仪就站不住脚。我听说，有一个将要显达的人名叫孔丘，是圣人的后代。……我若死去，一定要把说（南宫敬叔）和何忌（孟懿子）托给孔夫子，让他们师事他而学习礼仪，以稳定他们的地位。”孟僖子这一年并未死，他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这年孔子 34 岁。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成了孔子的学生。在这件事情上，孔子因孟僖子能补过而称赞他是值得效法的人。他说：“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左传·昭公七年》）可见孔子的精通礼仪、传授礼仪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孔子要求学生熟悉礼仪，且一言一行都要“节之以礼”。他的学生子夏深明老师的用心，当他自己做了教师后，也是将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及礼俗习惯作为“先传”的必修课程。正是由于孔子的重视和培养，他的学生中有不少精通礼仪之人。如公西赤曾谦逊地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论语·先进》）意思是：并非是说我已经有这样的本领，我只是愿意学习。宗庙祭祀或同外国会盟，我愿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当个小司仪。孔子对公西赤的评价则是：“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如果公

西赤只能当诸侯的小司仪，又有谁能当大司仪呢？)

对于初入孔门阶段的学生，孔子还为他们开设有军体及事上的艺能课程。具体内容主要是射、御和书、数等。射、御和书、数均属六艺。六艺和六书不同，六艺是西周时期的主要教育内容，孔子对此加以继承，六书是孔子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自己改编修订的；六书偏重于文化知识的传授，六艺则偏重于才能和技艺的训练。

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射、御都是古代的军事课程。孔子培养的士是治术人才，是文武兼备、亦文亦武的。孔子认为立国要文武兼备，仅就办外交来说，不仅要有善“言语”的外交家，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军事准备。孔子任鲁国的中都宰时，齐约鲁会于夹谷，企图通过这次会议，使鲁国屈服于齐。孔子受鲁君之命，担任了会议的司仪。孔子向鲁君建议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接受了孔子的建议，带武装力量随行。由于这次文事与武备俱佳，这次会议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使齐国退还了侵占鲁国的郛、讙和龟阴的土地。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通晓军旅之学。孔子本人善射长御，是文武兼备的大师，他又不隐其学，自然要将这些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弟子。在孔子讲学的地方，不仅有杏坛，也有射圃，孔子经常带领弟子习射于圃。他要求学生接受完备的军事教育，不仅学射、学御，还要学礼仪、学军舞、学战术。他的不少学生也像孔子一样善射御，具有军事才能。如：子路、冉求、樊迟、有若等。在著名的齐鲁之战中，冉求帅左师，并推荐樊迟帅右师，打败了强大的齐兵。鲁国季康子问冉求：“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回答说：“学之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向鲁定公建议，解除家臣的武装，堕三桓之三都。孔子的学生子路协助孔子，是具体主持堕三都的。以上史实告诉我们，孔子教弟子是既讲文又习武的，在他开设的课程中确有军

事科目。而在中国古代，军事和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自卫和卫国。因此，有人说：没有体育的军训以及没有军事目的的体育是没有的。”（见《从射、御论证孔子体育思想》，载《光明日报》1962、3、27）射、御是军事训练项目，并不妨碍它们同时也是体育项目。正如我们今天的跳伞运动是军事体育项目一样。军事、体育二者一体，是中国古代体育的特点。

射、御是军体课程，同时也是培养未来官僚事上的一种技能。孔子的学生如冉求、樊迟等，经常在孔子外出时为他驾车。孔子本人也喜钓鱼、精射猎、会驾车。除射、御外，书、数也是事上的技艺。书是刻字，孔子之时，无纸无笔，人们用刀在竹木版上刻字，同现在的写字一样，是学生最基本的技能训练，但刻字当然要比今天的写字难度大，决非一日之功。数即古代的数学知识。孔子设书、数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载之以言的能力和计算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可为统治者做事。《论语》一书中没有孔子教学生学习书、数的记载，但实际上，孔子要求学生“游于艺”（《论语·述而》）。他多次称赞“冉求之艺”，说：“求也艺。”把“冉求之艺”看作是“成人”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自己也曾说自己：“我不试，故艺。”（《论语·子罕》）太宰曾称孔子多能。孔子知道后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里“游于艺”的“艺”和“多能”中的“能”都是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实际技能来说的。孔子本人删诗书，订礼乐，编写《春秋》，载之以言的能力自不必说，他20岁左右曾当过季氏的委吏（主管会计、仓库），搞得帐目清楚，也曾为乘田（主管畜牧），搞得“牛羊茁壮长”（《孟子·万章下》）。孔子的好多学生，如仲弓等也做过季氏的总管，能管理经济；子贡善经商；这都需要有数学才能。孔子弟子的事上技艺自应也是学之于孔子。

总之，对于初入孔门的学生，孔子为其开设的课程主要就包括：道德概念的认识、道德及礼俗行为和习惯的培养，以及军体

及其他事上技能的训练。其中以道德修身课程为主，其他技能、技艺训练课程为辅佐。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后，学生就逐渐步入升堂阶段的学习。

对于升堂阶段的学生，孔子为其设置的课程不外乎仍是道德修身课、智能知识课和技能训练课。其主要内容为《诗》、《书》、《礼》、《乐》等。

《诗》、《书》、《礼》、《乐》在西周即作为教育内容。《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诗》、《书》、《礼》、《乐》加以整理修订，作为教材向学生传授。

《诗》是上至西周，下迄春秋时期的诗歌选集，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集，被后世尊为《诗经》。孔子曾对《诗》作过修订。关于孔子修《诗》，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孔子将古本《诗》十删其九，选编三百零五篇。此说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诗三百》在孔子之时已经成为习俗常用的专有名词，并非孔子删订之后才有此书名。孔子将《诗》作为教授门徒的教材，对《诗》是作过一些增删、更动和调整的。孔子本人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第二种看法较为符合实际。理由有二。理由之一是：孔子自卫返鲁，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是年孔子已68岁。在此之前，《诗三百》已基本上成为定本。《左传·襄公廿九年》记载，吴季札观乐，乐工为之所歌之诗，就是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与今本《诗》的编次、篇数基本一致，是年孔子只有8岁。孔子在68岁之前，每次提到《诗》，也总是说《诗三百》。《论语·为政》记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子路》篇也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